

拉美政治

## 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

——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

钟智锋

**内容提要：**20世纪末，拉丁美洲出现了两种型塑拉美政治变迁的重要运动——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本文以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选取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为个案，通过历史分析和横向比较考察两者的关系模式与变迁趋势。研究发现，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是动态和多元的。天主教的右倾或左转是拉美政治钟摆的重要社会动力：天主教的右倾推动了军人政体的建立，天主教的左转则促成了左翼的上台执政。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模式存在全面对抗、全面合作和部分合作三种模式。在民主化时期，三国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在巴西，团结的天主教与左翼结盟反抗威权；在智利，分化的天主教与左翼结成选举联盟终结了威权；在阿根廷，分化的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疏远并消极地反抗威权。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主要受到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和政治压制程度的影响：军政府的政治压制程度越高，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越大，天主教越容易与左翼政党结成同盟。

**关键词：**拉美政治 左翼 天主教 民主化 军人政体

**作者简介：**钟智锋，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91；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8) 05-0073-13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转型期中国宗教场所负责人的政治态度”项目（编号：16CZJ028）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末，拉美社会出现了两种型塑拉美政治变迁的运动——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这两种运动不仅有明确的理念和议程，还有颇具行动力的组织载体（含国内组织和国际联盟）。它们对拉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对拉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迁都有重要的影响。

“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和“劳工社会主义”等左翼主张的流行，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左翼政党论坛的建立，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左翼政党组织在世界左翼政党联盟组织中地位的提升，是左翼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解放神学等主张的流行，拉丁美洲主教会议（CELAM）这个区域性议事机制的建立，基督教民主党或政党联盟上台执政，拉丁美洲基督教在世界基督教地位的上升都是天主教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对它们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拉美社会的走向，也有助于再思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现有对拉美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左翼运动上，这些研究往往以政党为核心，并持左右二分的视角。已有的研究对基督教这种重要社会力量的影响及其变迁缺乏关注，且往往把它和左翼运动看成是对峙的双方。然而事实上，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年，简称梵二会议）以来，随着解放神学的提出，拉美的天主教已明显左转，不少国家的天主教已与左翼结成联盟。静态的、左右二分的视角已无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的变迁。本文以拉美天主教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这三个国家为个案，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呈现了天主教运动和左翼运动之间多元、动态的关系。

## 一 拉美左翼运动研究状况及本文视角

学界对拉美的左翼运动已有基础性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的学者聚焦于左翼内部的分野，并把左翼政党划分为激进左翼和温和左翼。<sup>①</sup>有的学者关注政治强人的影响，归结出一种“查韦斯—莫拉莱斯—乌马拉现象”。<sup>②</sup>有一

① 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6—8页。

② 刘维广：《拉美所举办“查韦斯—莫拉莱斯—乌马拉现象及其启示”研讨会》，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些研究分析了左翼兴起的推动因素。<sup>①</sup>有的学者把焦点放在社会思潮上，梳理了左翼运动中的各种思潮。<sup>②</sup>有的学者从历史条件、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总结了共产党、社会党和新左翼的基本内容。<sup>③</sup>有的学者则关注印第安人问题，指出左翼运动背后的民族根源。<sup>④</sup>

但已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1）在拉美这个基督徒人数占绝大比例（90%）的大陆，忽视宗教的力量和变化，只把宗教看成是一个背景因素；（2）基本上依赖左右二分的方法，并机械地把左翼和天主教放在两个对立的阵营内；（3）重视政党和领袖，忽视社会群体分析，没有注意到社会群体（如天主教）的立场转向对左翼执政的关键影响；（4）缺乏比较的视野，不重视因果分析。

对左翼运动的研究仍存在两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一，左翼执政反映了拉美政治的钟摆现象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迁？换言之，拉美政治是否显著左转？第二，如果拉美政治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左转，促成这种转变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赞成论和怀疑论。前者认为拉美政治的确显著左转，后者虽承认近20年来拉美左翼势力在部分国家显著上升，但并不认为这是结构性的变迁。例如，张凡对拉美政治显著左转持怀疑态度，认为左翼的未来仍取决于它是否能探索出一个较好的治理模式。左翼执政可能是拉美政治钟摆模式的一个阶段。<sup>⑤</sup>袁东振和杨建民主编的《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对该地区一些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成败做了总结，亦认为政党兴衰在拉美政治中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sup>⑥</sup>笔者认为对天主教和左翼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这场讨论。本文将通过历史分析和个案比较说明，天主教的右倾和左转是拉美钟摆效应的重要动力；由于拉美政治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向，不少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已经左转，在一定条件下将有助于左翼崛起并巩固其执政地位。

<sup>①</sup> 焦震衡：《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5-28页；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5-6页。

<sup>②</sup> 徐世澄主编：《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sup>③</sup> 崔桂田、蒋锐等著：《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sup>④</sup> 刘承军：《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4-66页。

<sup>⑤</sup> 张凡著：《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275-314页。

<sup>⑥</sup> 袁东振、杨建民等著：《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12页。

本文选择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案例，其理由如下。第一，它们都是地区性大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第二，它们在宗教构成上（体现为新教和天主教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有助于我们验证宗教多元程度对宗教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阿根廷是一个天主教占主导性地位的国家，巴西和智利则有着较大的宗教多元化程度。第三，三国的政治参与空间存在差异，有助于我们检验政治空间对宗教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巴西和智利的政治参与空间相对更大，阿根廷的政治参与空间相对较小。第四，在民主化时期，三国执政当局对民主抗争的压制程度存在差异，有助于我们检验政治压制对宗教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1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的宗教构成 (%)

	天主教	新教	无宗教隶属	其他
巴西	61	26	8	5
智利	64	17	16	3
阿根廷	71	15	11	3

注：无宗教隶属这个群体大多数不是一个无信仰的世俗群体，而是有信仰但不归属于某个特定宗教组织的群体。阿根廷的无宗教隶属群体多为天主教徒。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n in Latin America: Widespread Change in a Historically Catholic Region*, 2014. <http://www.pewforum.org/2014/11/13/religion-in-latin-america>. [2018-05-10]

本文从情境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分析问题。这种视角认为大多数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静止不变的，而是具有多元的组成部分，而它们又会随着环境变化而作出程度不同的调适与变化。与本质主义相比，情境主义更强调事物内部的多样性、外部环境的影响力以及事物的变动性。起到型塑作用的环境因素，除了经济状况和外部环境外，主要还包括政治制度（威权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和宗教市场格局（垄断的市场还是竞争的市场）。宗教团体作出调整的方向主要包括跟政权结合还是分离，持有保守的神学观念来维持现有体制还是持解放神学以变革现状。

本研究强调多元性和动态性。基督教内部存在多元的团体（相对保守的教阶和较为激进的底层神父），左翼运动阵营内也存在多元的政党（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传统左翼和新左翼），因此，基督教与左翼政党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而言，较为激进的底层神父更容易与温和左翼结成同盟，比较保守的教阶则常常与激进左翼发生冲突。天主教运动和左翼运动的关系，既取决于环境因素，也取决于它们双方的

立场和行动。

宗教的多元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宗教市场里存在着多元的宗教，同一宗教内部存在多元的声音和组织。前者主要源于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在拉丁美洲的兴起打破了天主教的垄断，使得宗教市场的竞争程度加大。这种宗教竞争也推动了天主教由认同精英到选择民众的转向。后者主要源于梵二会议，它既提高了平信徒在天主教的地位，也推动了天主教的现代化。这加大了教阶与平信徒组织的张力，也使天主教逐步分化出保守、居中和激进三个群体。这种内在的多元性使天主教在应对独裁政体时产生出多元的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模式：（1）上层和下层均不反抗，（2）下层反抗而上层沉默，（3）上层和下层一起反抗。

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和政治压制程度都会影响天主教的认同对象（精英—民众，政权—反对派）和政治参与的策略（体制内参与—体制外抗争）<sup>①</sup>，进而影响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关系。一般来说，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越大，为赢得信众，天主教越可能认同民众，从而与左翼运动结成联盟。此外，政治压制程度越大，天主教越可能跟军人政体脱钩，从而与左翼运动结成联盟。

鉴于天主教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挑战、所持立场及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以民主化作为分水岭，把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的拉美历史划分成军政府时期（六七十年代）、民主化时期（80 年代）和当下（9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以便呈现出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历史变迁。此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把分析焦点放在了天主教这个在拉美社会中最主要的宗教团体，暂不讨论新教团体与左翼运动的关系。<sup>②</sup>

---

<sup>①</sup> 有关政治参与空间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参见 [英] 胡安·J. 林茨、[美]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71-90 页；有关宗教多元化程度对天主教的影响，参见 Anthony Gill, *Rendering Unto Caesa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9-120.

<sup>②</sup> 新教与天主教有着不一样的阶级基础、对美态度和政治议程的广度。一般来说，新教的阶层基础更接近底层民众，更加亲美，政治议程更为有限（集中在社会文化议题）。若想进一步了解新教的政治参与情况，参见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lackwell, 1990; Paul Freston,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6 卷下），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第 9 章。

## 二 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兴起：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

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存在着各种曲折。20世纪末，拉美社会出现了一种综合性危机。这在政治上表现为独裁与动荡，在经济上表现为外债高企与贫富分化，在社会领域则表现为失范和传统纽带的弱化。为了应对这些危机，拉美社会出现了两种显著的社会运动：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

左翼政台上台执政是左翼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在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赢得大选；在巴西，劳工党上台执政；在智利，社会党与其他政党结成中左翼联盟，连续执政；在阿根廷，信奉庇隆主义的正义党赢回大选并连续执政。左翼政党能产生卢拉、查韦斯、莫拉莱斯等政治强人，能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社群社会主义”和“劳工社会主义”等给人变革希望的主张，能有效调动民众快速地变革现状以应对危机，这是其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

除了左翼运动外，拉美社会还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天主教运动。天主教运动与左翼的结盟是左翼政台上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天主教运动是由一系列主教会议所推动的。1962—1965年，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召开了梵二会议，标志着天主教对现代化的态度由拒斥到拥抱，与时俱进、关注时代成为梵二会议的重要主题。这次会议推动了天主教的系统性变革，使其逐步由一个保守的团体转变为一个进步的组织。1968年，拉美的主教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召开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提出了解放神学的理念，强调教会应该关注受苦的民众并致力于人民的解放。1979年，拉美的主教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召开第三届主教会议，再次重申教会要关注穷人，致力于实现经济正义，并提出了“以穷人及其解放为优先事务，与穷人及其解放共休戚的选择”（简称“选择穷人”）的口号。这一系列的主教会议不仅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神学——解放神学，还创造了一种更有行动力和政治关切的俗众组织——基础团体（Base Community, BCE）。<sup>①</sup>

与保守的传统神学相比，解放神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

---

<sup>①</sup> 有关解放神学和基础团体对拉美政治的影响，参见 Daniel H. Levine, *Popular Voices in Latin American Cathol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53；弗兰克·K. 弗林：《解放神学与拉丁美洲政治秩序》，载《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1–2期，第45–51页。

方法分析社会问题，并指出危机背后的阶级根源；教会的使命不是维持一种秩序，而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强调罪和救赎的集体性，认为剥削与压制是一种集体性的罪，要完成救赎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抗争甚至革命成为了一种可欲的手段。除了神学革命之外，这一系列的主教会议还带来一种组织变革。过去，天主教主要依靠由教阶建立和领导的公教进行会（Christian Action）组织俗众进行传教，开展社会慈善活动，维护天主教伦理。但是，公教进行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且在二战后逐渐衰落。当由信众自发建立的基础团体出现后，它取代公教进行会而成为天主教内最重要的俗众组织。与公教进行会相比，基础团体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行动力，且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抗争。

宗教市场格局的变化也推动了天主教的转向。过去，拉丁美洲基本上是一块由天主教垄断的大陆。随着五旬节运动的发展，拉美国家已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新教群体，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竞争迫使天主教转向民众，回应底层的呼声。

拉美的现代化危机、梵二会议以来的天主教会议、宗教多元化程度的增大，这些都推动了天主教从保守神学到解放神学，从聚焦精英到选择穷人，从教阶主导到基础团体影响上升，从跟政权结合到与政权分离，从支持威权到拥抱民主等方面的转向。这些转向不仅使拉美天主教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动员力，也使它明显左转，更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这些改变使得天主教能与左翼运动结成联盟，一同反抗军人独裁政体、推动社会正义。下面从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比较两个方面考察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进而讨论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

#### （一）纵向历史分析

历史上，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是动态的。在军政府时期、民主化时期和当下三个阶段，两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一样的，它们的政治焦点也随之变化，它们的关系也因而有所不同（见表2）。

表2 不同历史时期天主教与左翼的关系

	左翼	天主教	两者的关系
军政府时期	革命	维持传统秩序	冲突
民主化时期	反独裁和不公	反独裁和不公	合作
当下	发展	发展，保守传统价值	多元化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在军政府时期，天主教作为保守的右翼力量与军队结成同盟，通过反对左翼的激进革命来维持传统秩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军队凭借自身的优势，借助美国和国内右翼的支持，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纷纷建立起军人独裁政体。在这个阶段，天主教选择与军人政体结盟，认为这是确保基督教文明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因为左翼要求激烈地变革现状并引起了政治动荡，出于维护秩序的共同需求，军政府和天主教会结成了联盟。例如，1964年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古拉特政权，建立了军人政府。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1976年，阿根廷的魏地拉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建立了军人统治。在三次政变中，天主教会均扮演支持者或默许者的角色。

在民主化时期，天主教与左翼结成联盟，共同推翻了军人独裁政体的统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社会出现了债务危机，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社会抗争的增多，军政府强化了社会管制，并严厉镇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天主教会在这个阶段转向了穷人，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抗争，军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由结盟变为分离。在民主化时期，天主教会和左翼运动都秉持反独裁和社会不公的目标，并逐步建立起联盟。这个阶段，天主教会出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并表现出日益激进化的趋势。

当独裁政府被推翻，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后，天主教延续着与左翼的同盟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巴西，天主教仍是卢拉的重要支持者；在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仍是智利左翼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穷人仍是天主教的焦点，但过激的派别已被边缘化。随着某些神职人员和信众激进化，罗马教廷为了捍卫天主教的基本立场，维护教会统一，干预了天主教内的过激立场。例如，尼加拉瓜某些神父参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革命而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到尼加拉瓜访问的时候公开表达了对此的反对立场。因此，拉美天主教逐步从激进转向温和。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左翼政党领袖丑闻的出现，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有可能会走向多元化。

## （二）横向比较分析

前面从纵向维度考察了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历史变迁趋势，发现两者正逐渐从对抗转向合作。下面从横向维度具体分析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在民主化时期天主教与左翼运动的关系模式。

### 1. 巴西：团结的天主教与左翼结盟反抗威权

在本文研究的拉美三国中，巴西的天主教是最有凝聚力的，它对民主化



的参与也最为积极，因此，它与左翼运动的结盟也最为显著。巴西天主教的凝聚力一方面得益于巴西教阶的开明，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巴西全国主教会议这个由教阶在 1952 年建立的协调机制。由于教阶能通过这个机制有效整合天主教内的各种力量（教阶和基础团体），而教阶又偏向支持社会抗争，所以巴西的天主教比较团结、统一，没有出现激进与保守的明显分化。<sup>①</sup>

民主化时期，支持军事政变的天主教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源泉之一。<sup>②</sup> 军人独裁政体建立之后，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大大地缩小。当公民社会和政党组织被禁言时，教会成为唯一一个能发声并为民众辩护的团体。例如，圣保罗枢机主教阿恩斯（Arns）不断地批评军政府侵犯人权，巴西主教全国会议也一直向军人政府施压，迫使其改善人权状况并逐步开放政治空间。1979 年 3 月，在卢拉的领导下，圣保罗三个主要工业区举行了 16 万人的大罢工。圣保罗的警察对工人罢工进行了镇压。阿恩斯主教带领天主教徒为工人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教会也成为工人集会的地方。在教会的调解下，工人的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

由教阶支持和引导的基础团体对于结束巴西军人政体、促成卢拉的当选和劳工党的上台执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与中产阶级联合支持工人运动是巴西民主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卢拉在一次访谈中也指出他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是因为“我有学生、工党、天主教徒支持我……我是解放神学的后代，我们的选民基础有一部分来自天主教基础团体”<sup>③</sup>。

## 2. 智利：分化的天主教以选举联盟的方式终结威权

在智利，天主教与左翼运动曾两度结盟：第一次是因为不满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弗雷的改革，第二次是因为不满皮诺切特军人政体的独裁。弗雷改革的失败导致天主教分化出保守与激进两个阵营。一部分原来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徒分离出来，建立了更为激进的左翼教会组织，如年轻教会运动（Young Church）、统一大众行动运动（MAPU）、基督教左派和基督徒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左翼教会组织发起了 80 人宣言（80 位神父宣告天主教徒应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去推动工人运动），组织了 200 人运动（200 个俗众占领圣地

<sup>①</sup> Jose Casanova, *Popular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4 - 134.

<sup>②</sup> 董经胜著：《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 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第 115 页。

<sup>③</sup> 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kaaNgNI\\_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kaaNgNI_c). [2018 - 05 - 10]

亚哥大教堂，公开谴责教阶不能有效消除社会不公)。他们抛弃了基督教民主党，并与左翼结盟推动了阿连德的当选。这次结盟因阿连德执政后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结束。天主教选择与军队合作以化解危机、重建秩序。

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实行高压统治，宪法被终止，议会遭到解散，政党活动被禁止，集会与新闻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持不同政见者遭到严厉镇压。这个阶段，天主教再次左转，并发起了社会抗争。由于皮诺切特约定了“还政于民”的时间（1988年）和条件（选举失败），天主教最后以基督教民主党与左翼政党组成选举联盟的方式终结了威权统治。1988年，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争取民主党、激进社会民主党等重要政党组建了智利中左翼政党联盟。这个联盟赢得了大选，结束了皮诺切特的军人独裁统治。这个中左翼联盟延续至今，是左翼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基础。

### 3. 阿根廷：分化的天主教消极地反抗威权

与巴西和智利相比，阿根廷的天主教总体上并不积极地反抗军人独裁政体，也没有跟左翼建立紧密的联盟。虽然阿根廷的天主教也分化出保守（来自教阶）和激进（主要来自俗众和底层神父）两个阵营，但是激进派受到教阶的强烈反对，未能与左翼建立长久的联盟。

天主教在阿根廷拥有垄断地位，它一直以“基督王国”（Christendom）模式来建构自己与政权的关系：政权对天主教予以扶持，并确保天主教的理念贯彻到社会生活中；作为回报，天主教给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这种模式一直从殖民政府延续到军政府时期，民主化时期也只是作了轻微的调整。在这种模式下，教阶很难跟左翼结成联盟，参与抗争的仅限于俗众和底层神父。“第三世界神父运动”（MSTM）是阿根廷天主教内最主要的抗争运动。这场运动由埃克托尔·博坦（Héctor Botán）等几位神父在1968年发起。他们于同年发表了一份《十八位神父的宣言》，标志着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致力于提高工人社会福利，并为工人运动提供支持。神父与工会的合作也使他们逐步转向庇隆主义甚至社会主义。1969年，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再次发表宣言，公开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同年12月，20多位神父在阿根廷总统府前举行游行示威，迫使总统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放弃清除城市贫民窟的计划。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根廷的教阶强烈反对神父们的左转，通过停止圣职、调到偏远地方甚至与执政当局合作驱赶外籍神父等方式阻止神职人员的激进化。直到军政府后期，阿根廷的教阶才改变其消极立场。但是，阿根廷教

阶仍没有像巴西和智利的教阶那样转向积极的抗争，而只是收回对军政府的支持，并减轻对激进神父的压制。因此，阿根廷的天主教在民主化过程中只扮演了非常边缘化的角色，天主教与左翼的结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激进神父。

#### 4. 三个个案的异同点

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天主教对左翼运动的参与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虽然三国的天主教都曾与军政府结盟以维持社会秩序，化解政治危机；但随着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加剧，天主教都发生了激进化的转向。天主教选择与左翼结盟参与社会抗争，是结束这三国军人独裁统治、推动左翼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力量。尽管转变的速度和程度有差别，但是三国天主教都逐步从认同精英转向选择民众，对军人政府的态度也渐渐地从支持转为反对。解放神学运动的发展，“选择穷人”口号的提出，使得天主教逐渐从精英转向民众。民主化时期，军人政府为了镇压社会抗争、维护其统治，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治压制措施，造成了不少民众的伤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主教收回了对军人政府的支持，并与左翼运动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助推了拉美的民主化。鉴于天主教的突出贡献，有的学者也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称为“天主教的浪潮”。<sup>①</sup>

除了这些共同点外，拉美三国仍存在两大明显的差异。第一，在与左翼结盟反抗军人威权政体这个议题上，巴西和智利的天主教比较积极，阿根廷的天主教较为消极。宗教市场的多元化或垄断性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宗教垄断下，阿根廷的天主教不用担心来自竞争者的威胁，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反抗给其提供优待的军政府。第二，巴西天主教更加团结，其抗争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天主教在智利和阿根廷则更为分化，其抗争更多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模式。智利和阿根廷的天主教都存在明显的教阶和俗众组织之间、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化。这两个国家天主教的左转往往是由底层带动的，激进派的积极抗争逐渐带动保守派的左转。与这两个国家相比，巴西的天主教更加凝聚，巴西的民主抗争一开始便是由教阶所推动。

#### （三）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天主教与左翼在很长时间里是对峙的阵营，但民主化时期它们已从分道扬镳的阵营变成和衷共济的同盟，这种同盟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在一些地方这种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sup>①</sup> Daniel Philpott, “The Catholic Wav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2004, pp. 32 - 46.

要理解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的动态关系，我们需要全面理解以下两个问题：过去，它们为何会分道扬镳并彼此对抗？民主化时期，它们为何能建立统一战线？这两个问题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天主教与左翼结盟的性质和条件。历史上，基督教与左翼并不总是对抗关系，它们间曾有过数次结盟的尝试。在19世纪的欧洲（主要在英、法、德），曾出现过一种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社会主义运动越发带有世俗主义和反教阶的特点，使得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逐步疏远，基督教民主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者和替代者。再后来，由于左翼运动直接冲击教会，教会被迫成为一种抗争的力量，基督教与左翼正式分道扬镳。不过，这种对立关系随着天主教的激进化和左翼运动的温和化而改善。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中，在反对独裁和促进社会正义等议题上，天主教与左翼又重新成为盟友。这种结盟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抗争对象即军事独裁、民众的贫困和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共享着相似的思想，某些左翼运动倡导的社群主义为天主教所秉持，而天主教的解放神学与左翼运动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此外，两者还有着重叠的群众基础，天主教的基础团体和左翼运动的群众组织拥有着共同的民众。当下民主、和平的外在环境也为它们的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天主教不必借助威权才能抑制反教权运动，左翼运动也无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天主教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结成统一战线。它们的关系既取决于外在的环境（是否面临共同的威胁——军政府，是否存在双方都想解决的问题——专制的政治制度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但更取决于彼此的选择：如果左翼运动向战斗的无神论倾斜，那么天主教可能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走向与左翼对抗的道路；同样，如果天主教选择与权贵精英结合起来维护不合理的旧制度，压制进步的民众运动，那么左翼旨在变革现状的行动必然会带有反教阶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双方结成同盟。梵二会议以来，与时俱进和选择穷人成为天主教的基本取向，天主教短期内不太可能回到与权贵结盟反对社会进步的旧路。贫富分化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天主教选择穷人的立场也不会突然改变，天主教与左翼运动仍存在着合作基础。只要左翼运动不教条地抵制宗教，不突破天主教的伦理底线，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来变革现状，那么天主教在很长时间内仍有望成为左翼的盟友。

### 三 结语

左翼运动和天主教运动是塑造拉美政治进程的两种重要运动，它们的兴起主要源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历史上，因为对社会秩序的不同取向（要求激烈变革还是维持既有秩序），它们成为对峙的两个阵营。在民主化时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因有共享的思想和共同的群众基础，两者结成联盟终结了军人独裁政体。除此之外，左翼的温和化与天主教的左转亦是两者结盟的重要推动力。天主教的左转源于梵二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主教会议，政治空间的开放则推动了左翼的温和化。当下，两者的关系虽已出现微调，但是两者的同盟关系没出现根本转向。由于天主教已进行了从保守到进步、从聚焦精英到选择穷人、从与政权结合到分离的结构转向，未来天主教有望继续与左翼结盟。

除了历史分析外，本文选取了巴西、智利和阿根廷这三个重要的拉美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笔者发现，在反抗威权方面，巴西和智利天主教最为积极，阿根廷天主教比较消极。宗教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影响了天主教与政权的结合程度，最终影响了它的抗争积极性。垄断的宗教市场使得阿根廷的天主教更消极地反抗威权。在天主教的团结程度上，巴西的天主教更为团结，智利和阿根廷的天主教则更为分化。巴西天主教的团结既得益于全国主教会议这个协调机制，也得益于解放神学在巴西天主教界的广泛流行。

天主教的右倾和左转是拉美政治钟摆的重要社会动力。天主教的右倾推动了军人政体的建立，天主教的左转则促成了左翼的上台执政。左翼和天主教之间多元的、动态的关系需要我们放弃静态的、二分的本质主义视角，这样方能更准确地把握复杂多变的拉美政治。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拉美国家的政治格局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这些差异既有来自历史、地缘（加勒比地区与南美诸国）、发展状况和民族状况（特别是印第安人的比例）的差异，也有来自军人政体和左翼政党（温和左翼还是激进左翼）的差异。因此，任何一般化的推论都需要非常谨慎。虽然天主教的左转与民主化和左翼的兴起是20世纪末拉美政治比较典型的趋势，但是本文的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一般化的判断。要得出一般化的判断还需要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黄念）